

期六第 JUN 21 1948 卷一第



訊通 論專 論 辯

短評 (一)司徒大使的聲明 (二)中美友誼的考驗
 (三)從政變到貝奈斯辭職 (四)預備上幾課?
用和平方法能否實現社會主義
 (一)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
 (二)用和平方法不能實現社會主義
 (三)答負生
 (四)答炳章
論一元化
訓練服務和研究
城鄉關係：敵乎？友乎？
 一二九的重演 (北平通訊)
 人民過這樣的日子 (華北通訊)
 中央大學的教授們 (南京通訊)
 文藝：哀念
 書評：方生未死之間

似李 本刊特約記者 方華 難生 章生 章
 彭 本刊特約記者 耀克
 袁林 呂負 炳負 炳
 本刊讀者投書

新新

刊周

版出日九十月六年七十三國民

印行

〇〇 辯 論 〇〇

用和平方法能否實現社會主義？

一、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炳 章

二、用和平方法不能實現社會主義……………負 生

三、答 負 生……………炳 章

四、答 炳 章……………負 生

一 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

炳 章

我們都假定社會主義包含私有財產制度的廢止，我還是認爲不訴諸武力的革命照樣能實現社會主義。顯然地，我們祇是就原則上作檢討，我們不打算對於業已用武力革命完成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加以推崇或批評，我們也不打算對於正在用武力革命或正在用和平方法期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論斷其得失。今試從三方面來發揮我認爲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看法。

第一，認爲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並非否認用武力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也並非否認革命爲人民的神聖權利。用武力革命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已有具體國家的事實——俄國革命——可以證實，我們毋庸置辯，我祇是企圖說明，即使不訴諸武力的革命也照樣能實現社會主義。此其一。革命是人民的神聖權利，我們認爲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並沒有否認人民的這個神聖權利。在法律秩序之下，革命固然是一種違法行動，但它無疑是一個超越法律的政治問題，祇要我們承認政府對於人民的要求是有限度的，或人民對於政府的忠誠是有條件的，我們必須爲人民保留於必要時可以拿出來行使的神聖權利。然而我們儘管主張革命的權利不可剝奪，它總是一種最後的手段；我們一方面作如是觀，另一方面仍可堅持用和平方法去實現社會主義。此其二。

第二，與武力相對的是理性，人類歷史的演變到現在的階段，理性已被公認爲我們所應努力建立的政治的基礎。人類的理性特質正是人類的驕傲，發揮理性在政治中的支配力量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時代使命。反理性的行爲

之表現於國內政治者是叛亂或革命，反理性的行爲之表現於國際政治者是戰爭。這些都是政治上的不正常現象，因爲它們的發生，皆由於人們有運用和平手段的機會而不運用，或有合理的辦法存在而人們不使其有被採納的可能。然而我們絕非無條件地爲國內或國際的現狀辯護，因爲我們並無一個概念中的國內秩序或國際和平，我們也決不以爲革命或戰爭本身有好壞，其本身包含是非。我們祇計較在特殊的客觀場合下，國內秩序有無存在的理由，或值得不值得維護；同樣的，我們也祇計較在特殊的客觀場合下，國際和平有無存在的理由，或值得不值得保持。祇要我們還覺得理性是人類應該不斷發揚光大的一個特質，我們就應該使它在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都能佔有其應得的地位。若就人類的政治生活方面來說，當理性爲人民所尊重時，他們決不會毫不加思索地施用暴力來應付明明用合理辦法即能迎刃而解的問題。我們對於用何種方法實現包含廢止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主義的看法，亦復如此。除非理性已全部被抹煞，除非統治關係已廢棄了理性而以迫害恐怖爲基礎，在那種情形之下，革命是唯一的解放途徑，否則我們不應該停止對於理性的追求。即使是廢止私有財產制度，實現社會主義，而所需要的時間或許會長些，所遭遇的困難也或許要多些，我們不能因此放棄了基於理性的和平方法。這就是說，假如我們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而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都可以到達這目標的路，一條是理性的路，它是一條崎嶇的遠路，一條是反理性的路，它是一條平坦的捷徑，我們的選擇應該是第一條路，而不是第二條路。

何以呢？其理甚明，我們的理想既在建立政治的理性基礎，我們當然希望基於理性的策動而實現的社會主義。

第三，爲要使社會主義實現後能持久起見，採取和平方法較之訴諸武力革命實勝一籌。這裡我們又能夠看到理性對於政治的莫大貢獻。政治上的和平方法包含說服，自由的選擇，與同意，它們都是理性在政治上的表現。反之，革命則包含殘殺，恐怖，與強制，其結果必然是憤怒與仇恨。所以如果訴諸武力革命，而用殘殺，恐怖，與強制來實現社會主義，我們承認革命可以成功，可是革命後的那種景象却是不甚愉快的。因爲在廢止了私有財產制度以後，有階級的社會一變而爲無階級的社會，大部份翻了身，但他們好像只是做了一場夢，感覺痛快，而不知究竟；至於另一部份人，也正因爲不知事情的究竟，他們沒有機會能把觀念立刻改變過來，於是心中充滿着憤怒與仇恨。爲了一般人都莫明事情的究竟，同時又因爲要不是求痛快，就是憤怒或仇恨，結果是在用了殘殺，恐怖，與強制贏得了革命的成功以後，不能不繼續地沿用殘殺，恐怖，與強制去維持新建立的社會秩序。這是理性在政治上被抹煞後的必然結局，也正是新社會秩序始終在風雨飄搖中，以及把四週

二 用和平方法不能實現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有許多不同的定義。但我們現在用這名詞，大體是指一種根本取消私有財產，澈底施行計劃經濟的社會。

因爲取消了私產，所以：不再有貧富不均的現象，因而就實現了社會經濟上的平等；有了這種平等，才又會實現真正的自由。又因爲澈底實行了計劃經濟，所以：不再有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而可以根絕失業，並且使供求呼應。凡此種種，都是社會主義必然的結果。

如果以這樣的社會主義爲一理想，爲我們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所趨赴的目標，我認爲凡是沒有特殊偏見的開明人士，都是會贊同的。爭論的焦點乃在：用什麼手段來達到這個目標？

有人提出來強力的手段（如馬克斯派社會主義），主張由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強力的手段，奪取資產階級所掌握的政權，然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來推行取消私產，計劃經濟等措施。又有人（如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派）認爲：上述社會主義的目標固然很好，但不贊成強暴力革命的手段；他們主張用和平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

二次大戰以後，英國工黨政府就在實行着費邊社會主義的主張。因爲戰

所有的人們視作敵人的根本原因。相反的，如果採取和平方法，而用說服，自由的選擇，與同意來實現社會主義，經歷當然要艱難得多，目標最後總會達到，而結果却一定十分圓滿的。因爲私有財產制度儘管廢止了，有階級的社會也儘管一變而爲無階級的社會了，那些翻了身的大部份人並不以一種不健全的痛快心理來承受新的社會地位，他們理智地認爲社會主義制度值得維護；至於另一部份人，也正因爲理智地認爲社會主義制度值得維護，他們被說服而忍受，他們獲得充分的機會與充裕的時間把舊觀念完全改變過來，沒有仇恨，也不憤怒。爲了一般人都是基於理性被說服，自由地選擇而同意或全力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新建的社會秩序就藉用不着殘殺，恐怖，與強制去維持，它不但可以持久，且又能在正常的，理智的，與和平的狀態下邁步跟着時代前進。

我的結論是：我們雖不否認人民於必要時行使革命的鬥爭權利，我們還是不應該放棄理性得能克服一切困難的信心。我們爲了愛護我們所要求實現的社會主義，所以主張儘可能先考慮如何配合客觀的環境，用和平方法來達到目的。

負 生

後英國的經濟極度艱難，一般英國人民都深知：英國能否從這艱難的局面中掙扎出來，繫乎未來的國運，所以工黨政府把有些企業國有國營的措施，才受輿論所支持，才被資本家所隱忍。然而，這件事實却激動了「和平轉變」(peaceful change) 論者。他們想：用和平的方法是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英國人很可能用議會這個萬能的機構以社會主義的立法 (socialistic legislation)，來把整個英國社會變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固然，在這「和平的方法」的背面，蘊藏着如許悲天憫人避免犧牲的善意，但我總認爲：假如取消私產制度乃是社會主義一個最基本的條件的話，則用和平的方法終於是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欲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亦即欲取消私產，非用強力不可。讓我說說我的理由。

(一) 我們得先問：取消誰的私產？私產是個籠統的概念，版稅、發明權、利潤、租稅等都是私產，究竟取消那一種、那幾種、或者全取消呢？這個問題很有爭辯的餘地，我們姑且不談。我們爲了本文的目的，姑且以利潤 (profit) 和租稅 (rent) 爲私產，因此所謂取消私產，就是取消資本家（又稱資產階級，下同）和地主的私產。

(二) 其次我們要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對於他們的私產怎樣看法？是視同性命呢，還是無足重輕？關於此點，我們願意指明：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私產有一種極自私的錯覺。他們認為：「你取消了我當做資產階級的存在，就等於取消我唯一的存在！」這就是說：不允許他們過那種豪華的生活，他們的感受就等於不叫他們活着！這是什麼邏輯？可是事實上，古往今來有錢的人都有此「同感」，因此，他們才視財如命，死不捨棄。

(三) 既明上述兩點，我們便要再問：是誰來取消資產階級的私產？兩個可能：一個是政府，另一個是人民。本節先說政府。假定從事取消任務者是政府，也有三種可能：

一、假定政府是袒護資產階級的（亦即代表他們利益的）：則這種政府根本不會取消私產的企圖。因為那就等於說：資產階級本身取消資產階級的私產，按第(二)節所說的情形，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二、假定政府是中立的（姑且認為中產階級有其固定的特殊利益，而中立的政府就代表他們的利益。不過，關於此點，我先聲明，還有保留的意見）：那就是說，他們可以企圖取消資產階級的私產。那麼，我認爲：即使這種政府想和平的方法來取消資產階級的私產，但亦必遇到資產階級強力的反抗。到了那個時候，不是無產、中產階級「革」資產階級的「命」，反而是資產階級要「革」他們的「命」了。資產階級對於他們在亡持續（即使是錯覺）的鬥爭，當然是不惜用強力的。假如他們企圖用強力來消滅中產階級的中立政府，那麼後者是不是也被迫而用強力的手段來對付他們呢？如果不然，那麼，取消資產階級的私產又成泡影；如果是要用強力，那麼，可見取消這種私產還得靠強力！

三、假定政府是袒護無產階級的：這情形也有幾個小的可能。第一個可能是：這政府取得政權即必是用強力（舊法律系統外的強力）革命得來的，如蘇聯。而他取得政權之後開始實施取消私產的工作，也必用強力（新法律

系統內的強力）壓迫不可，用和平的說服是不可能的，也如蘇聯。第二個可能是：這政府取得政權是用和平的手段，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在事實上，尚無此例。英國的工黨顯然不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我們要注意的是：即使有一天英國共產黨用和平的方法取得政權，但當他們執政後徹底實施取消資產階級的私產時，他們也必須使用強力的壓迫方可；而對於這種強力的壓迫，也必遭遇到強力的反抗，因為那侵犯了資產階級神聖的財產權利，那仍然需要強力來最後解決一切。

(四) 假如這取消私產的任務不是政府做，而是人民做，那麼：一、如果這「人民」是資產階級，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照上述第(二)節的理由，這等於「自掘坟墓」。二、如果這「人民」是中產階級，他們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不會有這企圖，因為他們的行爲不會和無產階級的利益一致。即使百分之一的可能有這企圖，但在實現這種企圖時，也必須使用強力，理由同(三)二，茲不多贅。三、假定這「人民」是無產階級，那麼這自然是最大可能的，但是他們也必須使用強力（舊法律系統外的強力，如蘇聯），而後才能達到取得政權，取消私產的目的。闡釋最後一個可能的文章很多，我不必再多說。

最後我願意提醒：在現存有私產制度的國家中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工作，不能期望政府來做，因為這種國家中的政府，大都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受資產階級的支配，它們根本不會有這種企圖。欲實現社會主義取消私產非推翻這種性質的政府不可，但這似乎就非由無產階級與一部分前進的小資產階級聯合用強力的手段不可了。

最後，我還有一句聲明：用徵收各種稅目（即使是極重的稅）的方法，來加重資產階級的擔負，甚至使他們「幾乎」不成其爲「資產階級」，我認爲不是澈底地取消他們的私產。

三 答 負 生

我們對於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基本假定，總算沒有歧異，也就是負生先生所稱「一種根本取消私有財產，澈底施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不過有一點，我雖不打算在此提出來辯論，但不能不有相當的保留。負生先生爲說明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起見，曾提及有了社會經濟上的平等，「才又會實現真正

炳 章

的自由。」以我的看法，我願意重視自由與平等兩者的相互關係，這就是說

，沒有平等的話，自由是虛假的，而沒有自由的話，平等也是沒有意義的；我不以單方面的平等與自由的因果關係爲一種正確的對於事態的認識。我的這種看法，與我所持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直接間接都有連帶關係。

負生先生說用和平方法實現社會主義，「蘊藏着如許悲天憫人避免犧牲

的善意」，其實，和平方法雖可以避免犧牲，却不一定單純地由於悲天憫人的心理。我在正文中曾說發掘理性在政治中的支配力量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時代使命，主張用和平方法實現社會主義正是要想完成這一種政治上的努力，絕非純粹基於人道主義的出發點，更何況我們並不否認革命的神聖權利，革命的存在理由必須以客觀場合來加以辯護的。

我同意負生先生再作一步的假定，即所謂取消私產，就是取消資本家地主的私產；我也同樣承認這些資本家地主，「視財如命，死不捨棄」。我總覺得負生先生的推論是太簡單化了，太公式化了。他說取消私產祇有發動自政府和人民兩個可能。政府如果是袒護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它就不可能發動取消私產；政府如果是中立的，它即使發動取消私產，必遭遇反抗，結果是非以強力不得成功；政府如果是袒護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也祇有用強力才能達到取消私產的目的。負生先生說到人民的可能，也是用的同樣的公式：資產階級決不「自掘墳墓」，中產階級也不致有此想，即使想做，也必須使用強力，無產階級當然有此企圖，但非用武力不能達到目的。於是結論就是：期望維持私產制度的政府乃屬不可能，唯有「由無產階級與一部份前進的小資產階級聯合用強力的手段」，才能把私產取消。

我願意請負生先生來看歷史上的不少事實，他應該能够恍然人類之事絕不會像他所想的那麼簡單公式化的，試舉例以明之：

第一，拿封建制度來說，它實然是封建勢力所「死不捨棄」的，像資產階級「視財如命」一般，然而封建勢力所「死不捨棄」的封建制度並不完全靠武力始被推翻的。負生先生如何用他的公式來解釋這個歷史上的事實呢？

第二，拿政治專制來說，君主權力在握，照理也應「死不捨棄」，尤其是因為權力比財產更為直接。歷史上固然有不少用武力革命推翻君主專制的例子，如法國革命，我們不能因此忘了世界上尚有其他角落，政治專制也照樣衰落下來，却並沒有經過武力的革命，英國即為一例。負生先生又怎樣用他的公式來解釋這個歷史上的事實呢？

第三，拿殖民政策來說，帝國的要保持其殖民地，如同資產階級要保持其私產，也一定是「死不捨棄」的，那麼依照負生先生的公式，殖民地也就非以武力的獨立革命不脫帝國統治了；我承認這的確說出了殖民地解放歷史上的可能是大部份的事實，可是全幅的圖景顯然並非如此。菲列賓的獨立，不列顛自治領(British Dominions)，如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或竟致印度)的自主，皆為現成的顯著例子，證明殖民地的解放，事實上

可以不經由武力的獨立革命。負生先生豈能用他的公式來解釋這個歷史上的事實麼？

以上三個例子足能代表私產以外的三種頑強的既得權勢，它們在性質上與私產固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樣的，因為較之私產，這三種既得權勢的死不捨棄的程度，恐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歷史上的事例，的確給予我們以啓示，以為我們行動時的南針。我要證明即以這三種頑強的既得權勢來說，武力並不是不能把它們推翻，而是除開武力，潮流的趨勢以及環境的壓力，也可能逐漸地減削或竟致消滅它們。它們若能遭遇它們的最後命運的話，在同樣的情形下，私產制度為甚麼不能呢？

如果說私產制度同我在上面所提到的三種頑強的既得權勢，各種情形不盡相似，我也可以僅就私產制度來說。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會根據蘇聯的典型組成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它雖然沒有完全取消了私產，但確予原來的私產制度以很大的限制，然而它並未經過武力的革命。像目前的地步假設能用和平方法達到，那麼再進一步做的話，自然也可以採取和平方法。再如英國，鐵路與礦如能用和平方法由私有變為國有，那麼祇要時機成熟，要求相當普遍，用和平方法也未嘗不能達到私產制度的全面取消。我不是說目前的英國工黨一定有此打算，至少我可以用它的成就來說明原則上用和平方法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最後，我更要附帶地有一個重複和一個補充：

重複的是：我並不主張無條件地用和平方法實現社會主義，因為任何改革，尤其是相當徹底的改革，也就是牽涉到負生先生所謂「死不捨棄」的資產階級的既得利益，我們是決不能無條件地期待的。假使事實告訴我們，原則也能為我們說明，除開武力，和平方法也能實現社會主義，那麼為愛護並做到社會主義的持久性，我們為甚麼要放棄採取和平方法的努力呢？

補充的是：即使為了事實上的必要，不得不用武力革命來推翻消滅一個專制的政權，同時又以社會主義來作革命的號召，並誠意加以實施，我還是以為革命的成功祇是表明了專權的沒落，至於社會主義應該尚須要基於理性的更廣泛的努力，來打定堅固的基礎。如果在革命告一段落以後，對內以報復與恐怖手段來樹立社會主義，對外則竟致連不主張用武力革命的同樣是社會主義的信徒與實際工作者(無論是政府或個人)也一概視為敵人，我不想信這是於我們所共同信奉的社會主義的前途有利的。

人類必須努力發展其理性的特質，要不然，政治的前途永遠是黑暗的！

四 答 炳 章

負 生

炳章先生這篇「用和平方法實現社會主義」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論據。我願意把他的主要論點，寫在下面；然後再加以討論：

(一) 炳章先生也認為社會主義，包括取消私有財產制度。
(二) 他承認用武力固然能夠實現社會主義，但用和平方法也能實現社

會主義。在此二者之間，炳章先生「堅持」採用和平方法來實現社會主義。因爲「理性」；爲我們所應努力建立的政治基礎，而「和平方法」就是理性的表現；武力是反理性的行爲。

(四)理由之二是：他覺得我們「必須」這樣做，因爲這樣可「……使社會主義實現後能持久」。何以呢？因爲武力包括着殘殺、恐怖、強制等等，這只有激起憤怒與仇恨，結果會演成連續不斷「以暴易暴」的悲劇，使社會永無寧日。反之，和平方法既是理性的表現，故包括說服、自由選擇、同意等等，所以「一部份人（炳章先生之意大概是富人），也正因爲理智地認爲社會主義制度值得維護，他們被說服而忍受……沒有仇恨，也不憤怒。」於是：社會主義實現後才能使富人心悅誠服而持久。

關於炳章先生上舉第(一)點，我們彼此都同意，並沒有爭論。問題乃在第(二)(三)(四)各點。茲將我對於以上各點的意見，略述如下：
第一、我要指出：炳章先生雖然在標題上肯定：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但是他的論證却祇是說我們「應該」用和平方法建立社會主義。不如此，則反理性。而在他的看來，即使和平方法是「崎嶇的遠路」，我們也「應該」走，因爲這樣便可以爲實際政治奠定一個理性的基礎。他並沒有充分說出：怎樣用和平方法「能」實現社會主義。這似乎有點「離題」。我這站在與他相反立場的人，大可以回答他說「是的，是「應該」用和平方法的！但是其奈「不能」實現社會主義何？」天下事有許多是「應該」做到的，而實際上「不能」做到：用和平方法取消私產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其中之一。這是炳章先生文章中一個漏洞。

第二、他開這個漏洞不講，炳章先生的文章中，又會再三闡述「理性」的重要。他所以「堅持」用和平方法實現社會主義的理由，乃是因爲和平方法，是「理性」的表現，換言之，他推崇「理性」，認爲用「理性」不但「能」取消私有財產制度，實現社會主義，而且還「應該」用它來取消。固然，民主政治就是發揚理性的政治，推重「理性」原是對的。但是據我所知：無論西方或中國的學者，他們天天喊「理性，理性！」可就是沒有給「理性」下一個確切的界說，以致每一提到「理性」這名詞，大家似乎祇有一種「不言而喻」的籠統理解：以爲「理性」大約是個「好」的東西，應該尊重「理性」等等聯想。我們現在應該把「理性」的意義弄清楚。弄清楚了它的意義之後，便可知「理性」並不像一般所設想的那樣的不受「偏見」及「感情」的支配。特別是它在人們的行爲中，並沒有多大的決定力量。既然如此，那麼「理性」能否使一部分人們放棄他們相依爲命的私產，就大成問題了。

在我看來，「理性」不過是我們對於是非、善惡、和美麗的判別能力。這種能力當然有先天秉賦的成分，但後天的教育則更充分地發揮它的特質。所謂「人是理性的動物」，就是說人能判別是非、善惡、和美麗。

(一)不過，我們却要知道：人們雖然都具有「理性」，但他們對於是

非、善惡、和美麗的看法，却大可以不同。在事實上，不但美麗的判斷有極大的主觀偏見不能一致；善惡的判斷更隨時空、空間、和民族特殊的風習而不同；至於對是非的看法，更常常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因此，我們第一要知道：說人們有「理性」，並不等於說人們對於上述事物的種種看法是「一致」的。

(二)既不一致，當然要有不調協，特別是對於爭點所在（例如私有財產制度的應存廢問題），勢必發生爭執。那麼在這種爭執中，「理性」能，否使我們捐棄己見而服從旁人的呢？關於此問題，我們須知：在理論上談，「理性」只是自私感情的顧問（休謨有此意見；邊沁以苦樂的感情爲主，以計算的智慧爲輔也可謂有此意見），它可以替自私的感情運籌策劃，但到了最後決定的關頭，人類的行爲，還是受自私感情的支配。在事實上講，取消資產階級的私產實際上便刺傷了他的自私的感情；即使他自己的「理性」告訴他：「取消你自己的私產會使全人類的生活都改善，」他的自私的感情也會反駁：「全人類的生活好壞與我何干？而取消私產則對我不利；取消私產，應勿庸議！」總之，我以為：對於無關痛癢的不同之見，「理性」尙有說服人類自私感情的可能；對於人們的經濟利益，因其關係最大自私之自我存在 (Self preservation) 及其改進的問題，「理性」祇能替自私感情打算盤，決不能支配它，說服它。

根據以上兩點，所以我斷定：至少對於取消私產說，「理性」並不能完成「說服」資產階級使其「自由選擇」或「同意」放棄其私產的任務！要取消他們的私產，非用強力不可。

第三、炳章先生又認爲：用理性的，和平的方法來實現社會主義可以使社會主義持久云云。因爲上面已證明了用和平方法不能實現社會主義，故此點應已不成問題。但我仍願專就此問題，加以論列。

我認爲私產對於人類祇是一個「習慣」，你儘可說它是具有悠久歷史的積習，但無論如何它只是習慣。即使你有卅年的烟癮，但你的吸烟和你的吃餅終不成比。我主張：取消這藉私產來維持生存的習慣固然非用強力不可（理由見上），而取消它之後，造成另外一個藉「共同生產，共同分配」來維持生存的習慣，也非用強力不可！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正是用強力改造人類根深蒂固積習的階段。當人們經長久的壓力（注意：這壓力的辯護是：對付少數人的，爲大眾的福利的。我們不能盲目地反對一切壓力），而適應新的生活條件與環境後，他們便可謂又獲得新的習慣了。既有了新的習慣（即藉「共同生產，共同分配」來維持生存的習慣），他們便又會維護這種習慣而不會反抗它了。當新的習慣已經形成之後，在一方面運用「殘暴」、「恐怖」、「強制」固無必要；而在另一方面「憤怒」、「仇恨」也自然就消失了。關於此點，我想很可以用政治學上每當法統改換時人民的 *Agony* 現象來解釋，未知炳章先生以爲然否？

論「一元化」

呂克難

近來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叫什麼「一元化」。假如這也像「擴大政府基礎」，「實行土地改革」，祇是做做文章，喊喊口號，拿來點綴點綴，倒也罷了。偏偏却不際而走，到處吃香。繼東北黨政軍一元化後，華北華中接踵而至，華南爲火藥氣較淡之區，以素不知兵的宋氏，尤一身總攬黨政軍的實權。其他可想而知。實際上以今日的中樞而論，表面上像煞是行憲，有立法院爲制衡 (Check and balance) 的主軸，實際亦不脫「一元化」之局。試想以憲法的謹嚴，尙且被開了天窗——臨時條款——，則如何能禁得住總統的威光不透過而入？這是辯論皆知的常識，無待深論。

所謂「一元化」，貌似玄虛，搞哲學的人或以爲唱的是「一元論」(Monism)。其實解釋這個怪詞，相差不過一字，「一元化」者一頭化也。在未一元化之前，黨政軍屬於三個系統，其權力操於三頭，一元化即歸併之爲一個系統，集中於一頭。我相信這番釋義，當局亦必首肯。

「一元化」的提出，在政府中人自然振振有詞，「戡亂」，「應變」，「加強行政效率」……統是理由。以爲非如此不足以應付瞬息萬變的大局。這裡不談民主，因爲民主是一切服從多數的決定，根本是多元化的。民主與一元化極不可通。唯有這末說才可勉強攀上一筆，那就是民主的根源來自全體人民的意志 (general will) 然而這一個「總意」集合的「一元」，與前述寡頭的「一元」，其精神其性質判若霄壤，絕不可等量齊觀。「一元化」之與民主「相背謬，彰彰明甚，無庸多提，反正任憑我說得唇焦舌敝，當局也不會理睬的。

本文的興趣着眼於爲政府打算。一元化能否強化施政的力量？這應是當局所樂聞的問題。回答這問題，我們得先弄清楚，權力的集中並不等於效率的集中。放開來說，效率的提高與否，決定於分工的精粗。美國工業所施行

的「合理化」制度，其全部結構的精神，不外力求分工的精密。經濟如此，政治何能例外，否則偌大的國事，可由一人獨攬，又何需設官分治。這是因爲個人的精力有其限度，能致其一不能兼致其二，即或天縱奇才，實際畢竟不能全局包辦。故而統統都管，實際不啻統統不管。抗戰時期的大後方政治，一人兼數差，連開會演說都感疲於奔命，自然談不上行政效率。這滋味今日官場中人類都知之。所以就理論觀點言，「一元化」以後，原來是三個腦袋在設想的，現在却只有一個腦袋謀劃了。這簡單的算學小學生也講得出，何以當局便不及此。實際上以中國官場中的習氣，推諉、因循、敷衍、「一元化」以後，可能連其領一加命的汽油，都非封疆大吏批准不可，誠然如此，當局者案牘勞形之餘，尙能何爲？恐怕嘆苦亦唯徒呼奈何了。

問題當然並不如此簡單，「一元化」的提出，深入觀之，其背後攜着一個嚴重的人事問題。此問題植根於以家族、鄉黨、地域爲擴張範圍的自我主義 (Egoism)。而其近年來演變的趨勢，如我在「沒有面的結合」(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星期論文) 一文中所指出，業已派生爲關係主義 (Relationalism)，即由個人中心藉其同學、同宗、同系、裙帶……的關係，形成異質而富有向心力的派系結合。這種結合在今日中國政治上，一面表現爲地域主義 (Localism) 力量的淵源，一面則成了不問是非鮮廉寡恥之政客附麗的對象。這次副總統競選，拆穿那些紙糊的民主窗子，骨子裡即是地域集團與政客集團的鬭爭。而這兩者，回到本題上來說，倒真正是「一元化」的大敵。民國以來，政府的主持者莫不嚮往統一，而這兩種惡濁的派系勢力，總是處處暗中作梗。政府夢寐以求統一，以爲中共的存在是統一的障礙，其實嚴格而論，不管中共的政治主張如何，理論上以及在實際的鶴的上，中共所期望的無產階級政府，決非分裂的政府，這是可以斷言的。唯有派系勢力，

因其行動在追逐永無休止的自我主義，除非天下由「我」一統，決計不會祈求統一的實現，反之則從中阻撓，唯恐天下不亂，以便混水摸魚，故而中國政治統一的大敵，擺在今日政府面前的，與其說是中共，無寧說是地域集團與政客集團的派系勢力。弄明白這一點，反身再看「一元化」云云在實際可能而且必然發生的作用，如我不敢恭維，我祇能體念當局苦心，却不能諒及其愚的。

「一元化」的初意，照我的猜測，是在廓清前述兩種派系勢力，以求人事調和而謀事權的集中。換言之，即委主持者以全權，在其轄區內有調度一切的權力。現在姑假定，賦與的權力十足發生效果，摧毀了派系勢力的暗中作祟，做到了「一元化」。然而我敢以斷言的，這樣的「一元化」其實際情形正如資本社會中的資本兼併，不過吞下小的，剩下幾個大的而已。睜開眼睛看看，今日主持大單位的達官，有誰非派系勢力的頭目或支持者，說當前前所述二大集團的影響之外，不是無知便是有心隱蔽，再不然即是此道中人，想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

這也許是杞憂，我但願本文的推論全屬杞憂。然而讀歷史的人想及晚唐的悲劇，不期然總會聯想到「節度使」所帶給唐室人民的災害。「節度使」同樣發軔於兵荒馬亂之年，是一千二百年前的「一元化」，即集軍政財諸權於一身的制度。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唐節度使之禍」云：「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嘗請命於朝，力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勢。……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請看，這是何等徹底的「一元化」，論理應有堅強的「亂亂」力量，可是實際「安史之亂」在先，黃巢稱變於後，節度使之設不但挽救不了唐祚，反助長了叛亂的聲勢，加速了李姓的覆亡。此因皇室中心的利益並不能完全涵蓋其臣子的利益，皇帝與將軍原不過是力量的比例，這在權力不為人民壓束的中國，權力跟着武力走乃是必然的事實。只有傻瓜才衷心誠服失了勢（武力）

訓練服務和研究

學年將要結束，一班社會學系畢業待位生問我在他們畢業之後，到社會上去如何應用學成的知識。另一班高年級同學想利用暑假假機會，去作社會實

的帝皇，善觀風勢握有實權（地方、人民、甲兵、財賦）的將軍可不會這般笨法，如黃巢「造反」時平盧節度使宋威之言曰：「昔顧勳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山南東道節度使亦云：「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翼後福」。讀史至此，我真為當局深探一把汗。這就心是基於眼前的事實：「一元化」之後的戰局不獨未見好轉，且無寧說是每況愈下了。我們聽說共軍稱若干部隊為「運輸隊」（意為是送軍火來的）更傳聞前線連師帶軍的敗垮。以國軍的配備而論，照強調美援的朋友說，應該大打勝仗，至少亦得保住不退。何其實際恰相反？可知這決不是制度上的得失問題，而係武力是否與人民意志相聯絡的問題；一種缺乏人民支持的武力，縱有現代化的配備，亦不能戰勝沒有現代武裝而得人民效忠的武力。有現代化的物質（原子能）而無現代化的精神（民主），那是死的，因為決定武器發生效力的終究是活生生的人。在這裡，有意志和無意志，自動與被動，便分出強弱高下。當局不從大局把握，着眼於民情的向背，徒流連於無謂的枝節與事，以為如此方能強化效率，看到了樹木不見森林，何其近視？這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我不敢預測一旦便政局急轉，各大單位中的握權者，是否重演民國初期割地兵爭之局。照中國歷史的「傳統」看，一個中心人物的「崩」倒，必牽連起互爭領導全局之權的戰禍。這幾乎是中國社會結構所決定了的。當中心勢力一去，你不爭別人會把你打倒，除非你撤下一家子老小以及前後左右圍繞你的親戚故知同寅相好於不顧，否則決不能擺脫這歷史慣性之鞭的重撻。而所謂擺脫，在人情上豈是輕易做得到的。

所以，總結起來說，「一元化」實在潛藏着無限的隱憂。我怕打倒了小的派系勢力祇不過是使派系勢力集中吧了。真正的「一元化」，是使一切依歸於人民的意志，由人民監督支配。不然除非天下一統，造成一頭化，再開倒車，否則視為「一元」，實際是由多數的「元」，集中為少數的「元」，其結果如上所述，祇有把局勢搞得更糟！

「一元化」云云，可以休矣！

三七、六、三於上海

林燿華

習工作，也問我如何進行實習研究的方法。這是學社會學者眼前非常實際的問題，我願意在這裏提出來討論一下。

無論是畢業生如何問世，或是高年生如何實習，我想他們都要切記訓練，服務和研究三位一體的原則。所謂訓練偏重學習，服務偏重工作，研究偏重思考，但是三者互相關聯，不能嚴格的劃分界線。實則，訓練為服務和研究的基础，服務為訓練和研究的目的，研究又為訓練和服務的改進。

何以訓練為服務和研究的基础呢？讓我先說明一下社會學的產生以及到現在的過程。社會學的出現迄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在草創的時代，學者們專門注重名詞的解釋與爭論，大家各執己見，自成系統，不問社會實情，閉戶自造其車。後來研究社會學的人加多，大家根據社會的各種因素，分成派別，進到學派時期。好比以地理因素為社會現象的解釋者，稱為地理學派，以生物因素為社會現象的解釋者，稱為生物學派。以心理因素為社會現象的解釋者，稱為心理學派。以文化因素為社會現象的解釋者，稱為文化學派。各學派中又有小支派，各立門戶，相互責難。這時期在理論上雖有長足的發展，對於社會實際問題仍無多大的補益。最後學者們漸漸的覺悟到空談理論無益，不如深入社會實際工作親身考察，以求得到實情，這纔進到建立近代科學的社會學的時期。說到建立近代科學的社會學，實應歸功於研究和民社會的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因有理論的訓練，帶着活的假設，親身投入和民社會，實際工作，直接觀察，加上前後稽核，往返思考，纔能得到了解社會真象的全貌。他們的口號是：「理論根據實情，實情符合理論」，不是如此，那能成立科學的社會學！人類學原是研究初民社會，而社會學研究近代社會，因為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在初民社會中研究的成功，同樣的理論與方法也可施行之於近代社會，這便一來人類學和社會學就無所分別了。所以本文所稱的人類學與科學的社會學實係同為一物。

由於社會學發展的過程，我們不難看到社會學自身的訓練，或是社會學能够擔負科學之林，實從連續的實際工作與研究思考中得到的。社會學之所以能有今日的成績，不知經過已往多少學者們努力的結果呀！社會學既已奠下科學的基础，我們現在研究的人就可得到方便的門徑。前人已經的錯誤，我們不再重複，前人已有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鏡。最重要的還是社會學已建立的一套原理與方法，我們需要認識。不懂原理無從實施服務工作，沒有方法何能談及研究思考。這也就是我所謂：訓練為服務和研究的基础。

大學裏成立社會學系供給課程，目的即在於訓練學生，使他們得有知識，能够服務社會，能够思考研究。經過社會學訓練的學生，沒有服務研究的成績，或是經過訓練者的成績還不若沒有訓練者的成績，此中錯誤不在於學

科本身，而在於訓練的實施。換句話說，訓練的不得當，罪在教員與學生，不能歸咎於社會學。我特別提出這一點，因為一般人認定社會學為空洞的學科，實則社會學並不空洞，而研究社會學的人則常有空洞的毛病。

再則，何以服務為訓練和研究的目的呢？概括的說，任何科學的探討和研究，最終目的都是尋求科學知識的應用。社會學為一門科學，它的應用的目的，也不能例外。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為社會現象，它應用時自以社會為目標。如果我們所學習和研究的理論，不能與社會實情配合，這種學問只能束之高閣，不堪列入科學之林了。

有了科學訓練，到社會裏去服務，到團體中去工作，就應知道如何使用團體生活美滿，使社會關係改進。我們在學校裏所學習的都不過是基本原理與方法的訓練，進到社會服務的時候，工作本身就是一種訓練，許多問題由於切身工作的關係觀察出來，解決問題的方案也由於實地經驗中得到。我們知道所謂社會現象，乃是人與人關係的現象，實地工作的人類學家，由於親身考察的經驗，體會到社會問題即是人與人關係的問題，所以他們說切實地觀察人類行為，個人與其他個人發生相互關係的行為，也就是普通所謂的社會關係了。

服務工作對於工作者不但是訓練，同時也是勉勵他研究的機會。由於實際經驗所發生的問題就能刺激工作者的思考，使他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試舉一個小小的例證：我在川康間羅羅區工作的時候，遇見一個黑夷首領，與他談話知道他對於夷族情形非常熟悉，以為機會難逢，取出筆記想要記錄我們的談話。誰知黑夷看到我的筆記，就閉口不發一言，後來詢問，他根本不作答覆，我們彼此關係也因此發生惡化。這是一種經驗的教訓，使我想出一種新方法。後來凡遇夷人必要記錄談話的時候，我與夷人作直接訪問，另由同行某君面向他方，好像思考作文的樣子，其實就是記錄我們的談話。這種技術實行得相當成功，因此我們得到許多材料。若非由於自己的經驗，這種研究的技術怎能產生？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到研究的嘗試與錯誤，都是從實際經驗裏漸漸的求改進發展。所以實際的服務工作，也就是給與訓練和研究的机会。社會學系設立實習研究，社會調查等課程，目的也不外乎使學生得到切實經驗，自求研究探討的路徑。

最後，何以研究又為訓練和服務的改進呢？我們已經說過，所謂研究偏重思考，特別思考探求解決問題的方案。社會學的對象既為社會關係，研究即當針對現實社會。社會學的研究如果限定書本，它將永久脫不掉文學的彩

色，不能真正成爲科學。社會不息地在演變，我們的研究應當跟着變化中的社會去探求。這也就是說，研究思考如和社會實情脫節，不但研究無用，社會學也就不能成爲科學。這樣一來，社會學的研究，必須由實地工作，服務經驗中，纔能得到社會真實的狀況。人類學家的實地研究，已經告訴我們，社會問題的產生，必由於親自經歷能視察得到，至於解決問題的方策，更非由於體驗實際問題刺激思考研究，則無從獲得答案。所以研究一方面依賴訓練與服務，另一方面由於研究的過程，可使訓練充實，服務改進。若此，社會現象變遷不已，社會學者的訓練，服務和研究也就跟着改進不已。

實地工作的人類學家，已把初民社區充爲實驗室，根據實驗的結果，又已劃策應用起來。非洲殖民行政的改革和美洲印第安教育的改進，不是很好的例證嗎？近年來美國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實地考察農村實況，無非採用研究初民社區的方法，以求達到農村復興改進社會關係的目的。哈佛大學商業學院發展工業中社會關係的研究，也是想從實地工作裏探求改進都市工業社

城鄉關係：敵乎？友乎？

袁方

討論城鄉關係時，有一點似乎值得特別提出來注意的，就是時空的屬性。百年前的城鄉關係，自然會與目前的大異其趣；高度工業化的美國的城鄉之間，和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又有顯著的不同。就時間上來說：工業革命以前和以後，城市和鄉村有一個最刺目的改變，以歐洲的情形論：一八〇〇年時，歐洲人住在城市裡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到了一九〇〇年增加爲百分之二十五。人口大量的從農村擠向都市；換句話說，鄉裡人大量的變爲城裡人，是工業革命以後的事。就空間上來說：在美國不僅許多城市是機械化的大量生產的中心，就是農村也是大量生產的園地。據貝克爾氏(O. E. Baker)的估計，一個普通的農民，一年經營的結果，加上僱工的幫助，除去養活他自己與家內三口人以外，還可以生產足夠的糧食與纖維質，去供給十二個住在美國城市與另外二個住在美國以外的人們的需要；可是在中國，靠土地爲生的人，差不多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鄉裡人不但吃不飽，穿不暖，還遭受到人多地少的壓迫。

城鄉關係，雖因時因地有不同的表現；可是大體上說來有相成相對的兩方面。城市離不開鄉村，鄉村也離不開城市，彼此互相依倚，構成一體，這

區的方策。一九四二年所創刊的「應用人類學」雜誌，更是極力鼓吹實地工作與學術研究的配合。無論初民，農村與都市，都是人類結合的社區，有共通的社會關係的原理，在研究方法上也就無所分別。這當然也就是人類學與社會學合流的趨勢。

社會學傳入中國已有四五十年的歷史，國人除在課堂上傳抄舶來品或在名詞上轉圈子外，到底有多少人切實實的走到自己的社會裏去作開學的工作？老實說，我們如要建立自己的社會學，就不能不用一番工夫把訓練服務和研究三者配合起來，那麼不但在學術探討上有所成就，在社會改進上也極有希望。

因爲畢業生與實習生的詢問，引起我作這篇談話，簡略的提出社會學的訓練，服務和研究三位一體的原則。現在記錄下來，以求教正於國內同工的社會學者。

是相成；城市剝削鄉村，榨取鄉裡人的血汗，或者鄉裡人困於城市，革城裡人的命，彼此對立衝突，這是相對。從相成方面看，城鄉是朋友，從相對方面看，城鄉是仇敵。

若是我們從一方面入手，分析城鄉的關係，見其偏不見其全，對於城鄉的基本連繫，難得透視出它的真象。城鄉關係，雖因時因地有不同的表現；可是這種表現不在它是朋友，或是仇敵，而是在「敵乎？友乎？」的格局如何相成相對的湊合。

有機的城鄉循環

城市和鄉村，原是人類社區生活的兩大方面。在古代只有城墾，沒有像現代的都市。城墾大致是軍事上的中心與宗教上的聖地。到了後來，城市不但是軍事的宗教的中心而且還是商業的中心和手工業製造的場所。中世紀歐洲的城市以及目前中國內地如雲南四州等地的許多城就是這種情形。

直到十九世紀初年，工業革命後，工商業發達，近代的都市相繼出現。歐洲在一六〇〇年時，萬人以上的城市不過十四個，到一九一〇年，就增加

到一六八個。五分之四或十分之九的都市，全是十九世紀的產物。都市不但大量人口住留的中心，也是大量機器生產的場所。城市的起源，雖然很早；可是城鄉問題的嚴重，是從工業革命以後爆發出來的。

這個嚴重表現在城鄉再也不是一個整體，而是城市壓倒鄉村，這是空前的變遷，可以自有機循環的崩潰上得到說明。

原來，城鄉的關係，在手工業經濟時代，是一種有機的循環。我們無須在中古時代的歷史裡去找事實，祇要看看我國內地的許多城市像四川雲南等地，就依然可以描出這個循環的特色。例如昆明和成都，城市裡的手工業者，十之八九都是來自農村的。他們背井離鄉的主要原因，由於經濟壓迫。地少人多，家鄉無法立足，不能不跑到城市，另謀出路。城市裡的手工業，是他們謀衣食的園地。他們雖然遠離家鄉，在異地成家立業；可是在他們的觀念中，有一種濃厚的念念不忘鄉土的深情。我在昆明和成都兩地作手工業研究時，和手工業者談話，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他們的那種鄉梓情誼。他們說家鄉雖然飢餓貧困，謀生艱難，可是畢竟是生長自己的老地方。同之過年過節總得要返里省親，或打掃祖宗的墳墓。要是年紀老了，手邊積蓄有錢財，多數人都有同樣的打算，回老家去買塊土地。城市的手工業者，雖是從土地上排擠出來的，可是鄉土還是屬於他們的，他們還是鄉土的子孫。一種濃厚的情誼，無形的把城市和鄉村聯繫在一起，不能分割。

不僅城市的手工業者，在感情上和鄉土難捨難分，就是手工業和農業之間也不能截然的一刀兩斷，彼此互相幫助，互相依倚，共同解決其中的人口的生存問題。在農村裡，農業有農忙農閒的季節循環，一年中農閒期為農曆一、二、九、十、十一、十二各月；而三、四、五、六、七、八、各月是農忙時。農忙時期，工作多，需要的人工也多，於是在農業的結構上，發生膨脹現象；至於農閒時期，工作少，需要的人工也少，於是在農業的結構裡就是緊縮的情形。此種膨脹和緊縮的現象一經發生，其中的人口勢必發生流動。城市手工業，便是此種流動人口的來去對象。在成都昆明，我們常常可以看見在農業消沉時期，便有一部份人口來到城市，參加手工業工作；而在農忙時，他們又回到老家栽田種地。不僅如此，而且手工業也有一種興衰疲憊的循環現象。據手工業者說：他們的工作在四、五、六、七、八各月為疲勞時期，這時期的工作少，人手也少。因為市場蕭條，貨無銷地，發生此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農忙。農民在播種插秧，春耕夏種秋收，他們那有閒暇，那有餘錢，可以來到城市添辦貨物？一俟秋收以後，不但有餘暇，而且

田土上的谷子，可以換到錢財，使他們的手邊活動了。鄉土風氣，嫁女迎親也多在此時舉行。因之農民不得不上城採辦嫁裝，還有過年過節的物品，也多在此時準備齊全。市場活躍，手工業品的銷路增加，手工業者也得忙碌起來，這是手工業的興盛時期為八、九、十、十一、各月。在舊曆年關，無論城市或鄉村都得歇業過年，所以十二及次年一月，城市手工業者大半停工。要到二月至三月又有一度的興盛繁榮，此後四月至七月便是消沉時期了。總之城市手工業的興衰與農業的忙閒，似乎恰成對照。正因為有法對照，彼此互相調劑其中過剩的人力而造成城鄉的有機循環。

儘管城市和鄉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個不同的背後，却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城鄉是一體不可分割，在人口的互相調劑上，有機的循環把城鄉連在一塊。

城鄉關係的脫節

在工業化都市化以後，城鄉的關係，一改舊觀，有機的循環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無機的循環。

在工廠制度下過生活的勞工，原也是脫離鄉土的農民，可是一旦脫離土地後，從此鄉土不再屬於他們了，他們也不再是鄉土的子孫。就是說城市和鄉村之間鮮明的劃出了一條鴻溝：到了城市就無法打回老家，也不願再回老家。過河拆橋，他們到了城市就得要永遠的在城市的生活中勇往直前，退後就是失敗，也就會倒在社會淘汰的深淵。工業化的先進國家關於這方面的事實是太多了。大家也許讀過史坦恩貝克的「憤怒的葡萄」，作者在這本小說裡描寫美國工業化過程上，機械化的生產無情的滲透到古老的鄉土去，把農民幾代都住在同一的鄉土情誼裡的生活，拆散得乾乾淨盡。靠家鄉靠土地的飯碗打破了，被迫得擠向都市靠賣勞力賺工錢過日子。農村的機械化不但把這些純樸的鄉民趕向城市；而且使他們破釜沉舟和老家一刀兩斷。這雖是小說家筆尖下的想象，本不足為憑，可是從這裡似乎反映出，工業革命後，城市和鄉村，在人口方面一個嚴重的事實：就是城市在大量吸收農村的人口作為繁榮的基礎。目前美國流行的一句話是「鄉村生產小孩，都市把他們消費。」據羅金教授 (P. M. Sorokin) 在他的社會流動一書裡所說的：「在最近六十年或八十年中，歐洲社會從中等階級去擷發上層階級所需要的人才，是很緊張的。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他們擷發得越深，現在差不多要達到社會的底層了。」都市的發展，人口大量集中，城市的繁榮反面成為農村

人才的凋竭。這是無機循環的特徵之一。

鄉裡人往城裡跑，並不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若是在人多地少的農業國家裡，土地的收獲有限，飢餓的威脅無窮，農民大量離地，在都市另謀出路，自是一條解決飯碗問題的好門徑。可是就在這個門徑裡隨之而來的鄉土和城市隔成兩個彼此並不照顧的心情。前面已提過就是脫離了鄉土的人也是忘却鄉土的人。在觀念的領域裡，城市和鄉村不再是一體。即以我國的情形而論：似乎也在深染着這種彩色，以往從鄉土裡出來的人，背境離鄉，大家都帶有榮歸故里的宿願，每逢佳節或是老年多半要回到父母墳墓的老地；就是死在他鄉，也不願在異地做鬼，要把屍首運回原籍。生在鄉土，死在鄉土，做鬼也要在鄉土；這是一種不忘本的德行。今日的知識份子裡，恐怕絕大多數都不會再願意回到鄉梓服務，他們頭也不回，那裡還記得自己的家鄉在殘破不堪的場面；要是他們遠涉重洋，遊學鍍金，無論是美國、蘇聯、英國、就是印度、他們一定會爭先恐後，離開鄉土越遠，也許就是自我比天還高的代價。這又是一種無機循環的特徵。

本來自產業革命後，鄉土逐漸失去它的獨立性——自給自足的獨立性。從此鄉村完全淪落在城市的支配之下，一任城裡人的心意，剪裁出各式各樣的原料製造的場所。有人說：「工業革命的結果，是使鄉村靠城里，東方靠西方。」這個「靠」字就把鄉村原有的獨立性的消失說得再清楚沒有了。什麼是原有的鄉村的獨立性，有加以簡單說明的必要。在手工業經濟生產的時代，鄉村不但可以生產原料；而且還可以自行加工的製造，鄉村的自給自足，就是它的獨立性。但是這個特徵在工業革命之後，被取消了。從此鄉村只能生產原料，供給都市的製造。這本是一種地域上的分工，原無可非議。可是工是分了，在合作的上面不過是原料與成品的交換，全然是一種物質交易的行爲。除去物質的交換外，似乎沒有其它了。說得過火一點這不過是一種利害的關係。金錢交換的關係，所以我們說這是一種無機的循環。正因為是一種無機的循環，鄉土也得跟着商品的市儂氣轉入貿易市場上成爲賺錢風利的一環。鄉裡人需要看城裡人的臉色，似乎喜怒哀樂也要跟着喜怒哀樂，鄉

裡人在生產的領域中再也沒有以往那種獨立自主的自由。土地上的五穀，不再是豐衣足食的靠山；而是城市工廠的原料。原料通過機器的加工，回到娘家，帶回的禮物是：土棉變成洋布，糙米變成機器白米了。這是無機循環的第三種特徵。

無機循環的特徵，自然還有許多，不必一一細舉，即以上面三點而論，似乎可以看出城鄉關係的脫節了。這脫節的現象很明顯的表現在城鄉只是利害的結合，城市與鄉村除了商品與原料交換外，在生活上感情上觀念上再也不是一體了。

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

城市裡興起的大量生產的制度，一定會破壞鄉土上原有小規模的自衣自食的局面，本是工業化過程上不可避免的，土法的製造，代之以機器，不但節省時間，還增加效能，除甘地以外，恐怕是沒有人反對的。城鄉關係的改變，由有機到無機，也是事有必至的過程。有機關係，城鄉尚是一體；無機關係，城鄉種下相互敵視的因子。今日城鄉的衝突，對峙，糾紛，也許是從無機的脫離裡產生的。在手工業經濟時代，城鄉關係似乎有一個完整的配合形式，因之調和多於衝突；在工業化後的城鄉之間，似乎沒有完整的配合形式，因之衝突多於調和。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嚴重問題。

打破城鄉的對立，抹平城鄉之間的鴻溝，在歐美已經在積極進行，所謂都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運動，確不是一種對症下藥的良方。使城鄉的關係不僅是利益的結合，還是一個共同不可分割的整體——互助共存。都市的繁榮建築在農村的繁榮之上。若是可以打一個比方的話，我願這樣的說：農村是根，都市是花，花要開得茂盛，一定要根長得結實。如果根不結實，凋渴，雖一時開出好花，那不過是時代的曇花！

在我們的工業化過程上，開出美麗的花架是每一個人都希望的。發展都市呢？還是繁榮農村呢？根據以上的討論，不是孰重孰輕，而是都市與農村如何得到一個並行不悖的重建問題。

本刊編輯部啟事

(1)本刊暫開短評，專論，辯論，論壇，通訊，文藝，我們的意見，書評，讀者來書等欄，每欄均歡迎投稿。
(2)本刊對於通訊一欄，想盡辦法充實，希望各地讀者合作，從全國各地，給我們以該處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事實的報導。每篇通訊，以二千至四千字爲合式，特別歡迎長春，天津，西安，蘭州，瀋陽，青島，濟南，廣州，重慶，成都，昆明，貴陽，柳州，衡陽，長沙，重慶，香港，台北等地讀者賜稿。
(3)本刊各欄，除專論，論壇，及我們自己的意見，一律用真姓名發表外，其餘用真姓名或筆名，應作者自便。但文責一律由作者自負，作者並須以真姓名見告。
(4)來稿請直接寄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十八號本刊編輯部。上海辦事處，專辦發行工作，不收稿費。

通訊

「一二九」的重演

反美扶日在北平

(北平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六月八日，北平十一院校學生五千餘人，爲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再起的傾向，舉行大示威遊行。軍警大批出動阻壓，東安門一帶木棍磚石齊飛，徒手學生重傷三人，刺傷十餘人。學生手裏的宣言，旗上的標語，反對的仍是日本；受傷的仍是學生；而動手打的，仍是中國的軍警。不同的只是十二年前的一二九學生是衝着風雪，今日的學生是冒雨淋着，從前軍警手裏是大砍刀和水龍，今日的軍警是美式鎗械而已。如果我們不看日曆，不記得曾經過八年的抗日戰爭，真不能不懷疑是置身在十二年前的「一二九」事件之中。

大示威前的小示威

兩年以來，美國扶植日本再起的傾向，不應刺激有眼睛的同學們，最近一年中，這些「傾向」一一都成爲「事實」，這些連續捲起來的「紅球」，使青年由關心而研究，由研究而證實，由證實而憤慨，到五月下旬，便發展成爲對國人的大聲疾呼。

這之前，各學校都分別舉行過對日問題的座談會，並對對日問題的測驗。測驗的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答案都認爲美國在扶植日本再起，而日本再起後依然是侵略力量，將來受害的必仍是中國而非朝鮮。

五月卅日，北大，清華，燕大，師院，中法，輔仁，北平鐵院，華北學院等校同學四千多人，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反對美國扶日及紀念五月卅大會」，天津南開及唐山交大等校均有代表，連頭一天剛從蘇聯到平的中正大學同學，立刻派代表參加。

當天便正式成立「華北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除了發出長達數千言的宣言，列舉種種事實證明日本已經再起之外，並向美使館，及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發出抗議的代電。當天的大會上，有朝鮮代表出席演說，指出美國扶植日本重新滲入南韓的

種種事實，說明日本仍控制着東亞的命脈。中正大學代表追敘十四年來身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的痛苦，希望國家提高警惕。接着是一幕卡通劇，裏面有日本軍閥的媚美取寵，也有對於政府失去外交獨立性的諷刺。大會之後，在民主廣場舉行隊伍檢閱，遊行示威。幾千青年男女，手拉着手，歌聲和口號起伏彼起，熱烈的義勇軍進行曲，今天又有了新的意義。

在隊伍檢閱的時候，群眾高呼着「我們要上街遊行」！這聲音立刻成爲一個聲音。這時北大紅樓的四周，已經密密佈滿了警察，一個個荷鎗實彈。主席團因爲事先沒有準備，同時怕有意外，勸同學慎重考慮。在炎熱的太陽光下，各學校各院系分組開會討論。結果是多數人同意主席團的意見，當天停止遊行。但也有許多人表示不滿，認爲同學不應把政府看成和人民對立，政府決不致願意美國扶植日本，爲這事件壓迫學生。

大隊分散之後，伸出紅旗的廣播器裏傳出同學們的喊聲。「同胞們！我們打了八年仗，死了幾千萬人，可是剛兩年多，美國又把日本人提拔起來了！但是因爲警察林立，行人不敢駐足，許多市民都站在河邊的東岸，側身聽着這憤怒的呼號。

清華同學乘校車回校的時候，北大同學排列在北大東便門高呼歌聲，車上車下，歌聲渾成爲一。路外的警察環立監視，同學便高喊着「學生警察是一家」，「警察先生辛苦了」，「警察也是愛國的」。許多警察忘情的笑起來，倚鎗而立，成爲暫時的參觀者。

當天有許多英美籍的男女記者，到民主廣場參觀，拍照，並和同學交談。他們表示完全同情學生，他們也反對他們政府扶日政策。同學們並沒有對他們「藐視」，也沒有對他們特別「殷勤」。在這裏看到中美人民的真正友誼和民族的和平與自尊。

一二 大示威前的筆示威

六月五日上海的血案發生，對於華北同學自然是一個極大的震動。四十多同學的被捕，和美專三同學的傷重斃命，把華北同學的愛國心化爲憤怒的火焰。

司徒雷登帶有恫嚇性質的聲明，更是火上澆油。六月六號，華北十一院校學生，對司徒雷登發出抗議的快郵代電，原文如下：

「南京美大使司徒雷登：我們尊重您以往對中國教育的貢獻，但我們嚴正抗議您以大使身份四日發表的干涉中國國是的談話，您對我們中國學生反扶日的愛國運動，極盡譏諷，這不是一個大使應有的態度。中國學生，是威武不屈，富強不淫的，我們堅決反扶日，反帝國主義！任何威脅（爲您所指的结果）與迫害，都不能阻擋我們愛國遊行。」

同時並發表了對司徒雷登的駁斥，關於司徒雷登的「沒有任何人能提出美國有使日本軍力永不再起以外之任何證據」，列舉美國保留日本三大軍港，在本州青森建立大型機場，日本神風隊員秘密赴美受訓，日本軍警潛伏於行政組織中，日本大批戰犯歸籍並重新受津津等等事實，說「拆穿司徒雷登的說教的，正是麥克阿瑟，凱南，斯提克，德雷柏乃至司徒雷登自己」。

對於司徒雷登說的不停止反美扶日，則必須準備「承受行動之後果」，認爲意在以停止援華威脅中國政府，迫使其鎮壓學生的愛國運動。他們說：「我們願意正告司徒雷登先生！中國學生是不怕的！我們更指出：司徒雷登四日的聲明，是美帝國主義進一步干涉中國內政，直接鎮壓中國愛國人民的信號。……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已經有一百年的光榮歷史，自五四運動後起，即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刺刀槍桿下成長，在萬惡的雲下成長，中國人民和學生不是任何恐嚇和暴力所能壓倒的。」最後他們並嚴正的指出，美國扶日政策的推行，「承受其後果」的不是中國人民而是美帝國主義。

這一個抗議書和一個駁斥書，是一通雙攻，如果示威是對美國人的話，實際上已經等於一個大示威了。北平各大學教授，如王健堂等，也一致認爲司徒雷登以大使身份，發表這樣恫嚇性的談話，有些「失態」。他們說：外國在中國的政治權已取消，大使應該安份作自己的分內的事，而不應該干涉人家的國是。

司徒雷登親手扶持起來的燕大，對他的聲明也一樣不滿。燕大學生自治會發表聲明，對司徒雷登學生愛國

運動，及失去大使立場之同情性談話，表示遺憾。說如果他是奉國務院命令，不得已而出此，則希望他辭去大使職務，仍回校主持校務。

三 六九次示威遊行

六月九日，各院校宣布「爲反對美國扶日及抗議司徒雷登大使聲明，並抗議上海六五血案」，總罷課兩天。參加的除，清華，北大，燕大，師院，中法，朝陽，鐵院，南開，北洋，河北工學院，唐山交大之外，私立華北文法學院也宣布參加，共同行動。

北大校方張貽布告，勸同學「冷靜考慮，愛惜本期有限之光陰，一般人的視線已集中在兩天罷課上，沒有對罷課的當天，「突擊」式的遊行便爆發了。

此次的遊行，是三路分進。九號上午七時，各路便一齊行動。清華和燕京一路，結隊向西直門進發，師範學院和北大第四院及華北學院同學，由和外進發，北大，朝陽，中法三校一部一千餘人，由沙灘北大出發。奉令阻攔的軍警，也分頭堵截。清華燕京一路走近西直門的時候，軍警便把城門緊閉，雙方相持甚久。後來城內出城的人和城外進城的人越聚越多，交通阻滯，同時還有許多瀾人下飛機入城或出城飛機，沒有辦法，恰好此時師院和北大四院一路學生趕到西直門，內外已經會合，便把城門打開。這兩路合成一路，穿過西單，經天安門，向東單進發，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宣言，各商舖的牆上，電車上，柏油馬路上，都寫滿了標語，大大小小的漫畫，貼滿了各處，遊行大隊的兩邊，有糾查隊前後巡邏，秩序非常好，大批軍警集中在東城，特別是戒嚴東交民巷美領事館，所以西城軍警不多，只有隨行「保護」，沒有發生什麼事故。

東城的一路，一開始便遇到軍警的節節阻攔，十時左右，軍警會對準衆向天開鎗示威，鳴鎗六響。但學生遊行大隊還是冒險前進。當他們遊行隊伍通過時，商民不顧軍警的驅打恫嚇，成群結隊的跑出門口，貯立遠望。看到活報劇中的日本人，又化着美國的勢力開始橫行的時候，有些老百姓當成是真的日本人，跑上去要打死他。但當那些老百姓看到軍警用馬鞭用皮帶開始打那些學生的時候，許多人落下眼淚。他們說：「我們真不懂得，難道我們被日本人欺騙了這麼多年，爲打日本死這麼多人，受這麼多罪！政府真還要日本再起來麼？」

大隊走到東華門的南河沿路北口，向天安門進發時，軍警便越來越多，而且發着警報，眼看便是要演出大

流血的慘劇，這時警察局長湯水成，稽查處長倪超凡等都趕到了。說民衆清共先鋒隊本來也要在今天遊行，已經把他們勸回去，希望學生也由此回校。否則一切後果治安當局不能負責。這種恫嚇性質的談話，當然更使衆激怒。賀麟幾次奔走於學生和治安當局之間，亦無結果。

從七時便出來的同學，沒有吃早飯，也沒有吃午飯，火傘高懸，塵沙撲面，但饑餓和疲乏壓不倒他們心中的烈焰，在歇斯中，口號中他們一直毫不懈怠，企待着主席團交涉出合理的結果。

下午一時許，軍警開始採取他們的「有效辦法」，一時秩序大亂，皮鞭，木棍，磚瓦，石塊在學生的頭上橫飛。軍警並第二次向空開鎗十餘響。結果學生受重傷的三人，北大理學院一個姓鄭的女生頭被打破。另外輕傷的有十幾人。這些兩年前聽到新到千山萬水復員到北平的學生，那時做夢也想不到短短兩年，他們又爲反對日本再起被中國人毆打受傷。

到下午二時許，清華，燕京，師範……這西城的一

人民過這樣的日子

洪水的災難

一次有形的洪水所造的損失總是可以計算的，但政治經濟尤其是軍事的潰決所造的洪水的災難却是無法可以計算的。最近在長城內外作了一次旅行。在這段公路上，看到華北平原上的溝壑累累，這必是每年洪水洋流後留下的成就，但出了長城，窗外高原上仍然處處是流沙縱橫，綠洲則稀少得像零落的星星。農家與水是不可分的，就像人類要生存之離不開空氣一樣。一片控制不住水的農業地區多麼悲哀，一個政治及經濟失掉了傳統的社會，只有讓軍事連年連月的作任性削伐，這豈不是自殺的道路。

當社會秩序恢復了以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相反地，社會秩序崩潰中，十步之內必有餓殍，十室之內，必有崩潰。太平歲月中的那套倫理信義，完全爲現實的風暴所摧毀。自私自利道德的準繩，冷酷却成爲避疫性的注射劑。城與鄉分離了，城有他的中心，鄉有他的理想富衍生的作物重新滋潤大地之前，勢不免有一個時間的荒蕪。

今天就是大地上開始荒蕪的時候，雖然地下的火焰在暗流，雖然一個新的社會在孕育，然而，陣痛的時間

路，終於排除沿途的阻攔，由南而北也到南河沿的北口，大集合的隊伍，終於「會師」，一陣掌聲和歡呼。旁觀的人又是滿眶的熱淚。

大隊集合後，經北河沿回到北大的民主廣場集合，舉行示威大會，教授中有樓邦彥費青等講演。他們很沉痛的說：「政府如果是人民的政府，便應該讓人民講話。」

在示威大會中，五千同學舉起鐵拳，爲反對美國扶日搶救民族危難宣誓。他們說這艱苦的鬥爭只是剛剛開始，今後爲貫徹此項目的不惜任何犧牲。他們明白今日他們多擔負一分苦難，將來千萬人便可以減少一些更大的苦難。

在這次遊行中，許多新聞記者都在學生挨打的時候熱淚盈眶，許多老百姓也悲在在的，這些淚不是屈辱，而是潛在的力量。八年的血債，人心的記憶猶溫，誰忘記了或忽視了這血流成河，誰便得準備承受這仇恨所結出的果實。

（華北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好長啊，有形的洪水與無形的洪水在沖擊，澎湃和洗刷這大地上的一切。在政治經濟軍事的大沉淪中，大家當真在願承永定河今年也會有個大汎濫，並行地作一次大沖刷。

神與人

石蘭花正紅的五月正是城市的熱鬧日子，等於四千湖的香汛，北方也是老百姓習慣上到長城腳下的妙筆山進香的日子。這可能是春耕期前城鄉交際的最後一次的手工藝品，換幾文辛苦錢來補助春耕費用。團圓成章，不足爲奇。日本人戰後，這頭兩年中，自有金頂的老奶奶出任馬歇爾，讓那一九三六年營業的福特卡車，滿載着平津的香客通過以陽交界的北安河，到另一區域來帶福源家。

到今年却不行了。五月九日起，妙筆山的香會頭兩天居然還有大汽車前往，而且也沒生問題。跟着警備司令部那命令禁止，說那香會區域完全去不得。於是那從鏡外的香客冷落了，萬壽善緣慈航老會的香帳已然發出，於是有人建議便在城內設好了顯。不少香客們的黃布香袋上每年朝山一次，都交留一個「虔誠」的印記，這

文藝

哀念

秋遠！今天從舊書中，出乎我意外地翻出你的照片。你坐在雲龍山的石欄上，眼望着遼遠的天空，在那裏沉思。這照片，是我們參加徐州會戰時，我們攀登雲龍山，我替你拍的，現在已經九年又半了，照片的一角已經發黃。但你眉宇眼睛的誠懇的神氣，却仍然非常清楚，栩栩如生。看着照片，我呆了很久，墮入悠長的沉思之中。但我並沒有流下一滴的眼淚。

要說我會忘記過你，我是絕對不相信的，你的面影，你的笑聲，經常地浮現在我的面前，我的腦際，連過去最瑣碎的記憶，也歷歷在目。但是，悠長的八九年來，我確實沒有為你寫過一篇文章，一首短詩，我沒有寫過一個字來哭你，追悼你。關於這，你如果地下有知，一定會覺得不解的吧？

你犧牲的消息，是我從報紙上看到的。和你一道倒下去的，還有高詠，這個年紀青青，只通過信而未見過面的朋友。噩耗傳來，送給我的是一份悲憤。但在當時，我卻沒有眼淚，同時也沒有拿筆寫文章紀念你們的勇氣。為什麼？因為，我寫過的追悼文章太多了，我苦痛地想：他們獻出了整個生命，為更多人的幸福，站到火線的最前面，而我，却等他們倒下了給他一聲哀歎，寫幾行字追悼，我算是做什麼的呢？我們的友朋中，幾年來倒在戰場中的，有新宇，有鄒林，有敏迅，有孟平，……我的悲哀已經過了極限，我感到我再寫文章是一種恥辱。於是我沉默下來。有時，泛起一陣傷痛的記憶，它犀利得有如刀刺，但我拿起來筆，總又沉重地放下。我自己輕輕地對自己說：『不要寫什麼，不要寫幾句可敬的死者，他們是不需要這些的，好好的活下去吧！常常的記起他們，盡完自己的力量，那便是最好的紀念，最好的追悼……等到勝利了，才是追悼的時候。』

就這樣，我們長別了之後，我又生活了九年，我因為別無所有，只有一支筆，便這樣零零星星地化費着自己的生命，苦難長年伴隨着。死亡也不斷來打擾，但幸虧都越過了。耗費了三分之一生命的精華，三千多天的

李 蕪

光陰，無以數計的困難折磨，這一段工程算完了，日日夜夜盼望着的「勝利」，夢也似的來到了。

當我聽到第一聲日本投降的消息時，我們跑了幾十里山路，打聽這消息是否確實，（那時我們正陷身在敵後的山村中。）消息證實之後，當然是一陣狂歡。但當聽完各處的爆竹，看過各處的國旗，歸來對燈獨坐的時候，却使我想起了你，想起了你們。

「這世界上再沒有他們了。」
我想着，苦惱地想着，我的眼淚流下來，不能遏止。這勝利是你們（和你們同樣命運的千千萬萬人）換來的，但你們却永遠看不見這塊土地了。

在勝利還非常遠的時候，我常常想：這次的大流血，我們的民族流汗可要流干了，流血的人可要得到補償了，我想着經過這麼多人血的灌溉，中國會從此年青，你們的屍體上會生出一切希望的新生嫩芽。那樣，你們將永遠活在生者的心中，永遠存在。

但是，可憐的，還不是你們的未曾眼見勝利，而是短短的一瞬之間，你們以生命換來的勝利之果已經發霉，你們的碧血已經被蓋上一層污血，這污血還在越積越厚，要使你們的血成爲白流，要把你們的血和人民的血遮斷。這是如何令人憤怒的事！

三月間，我又從徐州經過，在火車轟轟的聲音中，我的心感到刺痛。黃口、楊樓、郝寨、那些地方雖然隔了八年，但我們是如何熟悉呵，記得我們突圍的時候，我們自己砍掉柳枝，擔着行李，腳底板磨得流血，擔自向前掙扎。當時敵人已經切斷離海路，黃口站長已經被打死，我們又退回楊樓，當天晚上我們把行李「存」到楊樓車站，準備次日突圍，但第二天却又被大敵轟回已經開始破敗的徐州。那些車站，至今還是殘破不堪，留着日本人破壞的痕跡，但是另外新的鐵軌，新的磚壁，新的標語，新的鐵絲網，却又布上了，這上面已經又染過幾層新的鮮血了。

徐記得，五月十三夜的黎明，我們離開徐州西行的時候，車站被炸得稀爛，站台上橫三豎四躺着傷兵，我們那時還建議站長把負傷者在黎明前移出站台，因為天一明他們便成爲敵機下的灰燼。這次經過，車站大致仍舊依舊，不過那時的傷兵不知那裏去了，換上的是剛從附近拾回的傷兵。買一份報紙，上面也還有一台兇莊激戰」的字樣。我凝視着這些新的傷兵，想着九年前徐州撤守時站台上那幾百傷兵，恍如置身夢境，這樣的「勝利」，是你當初所想起的麼？

從上海回來，我特地在徐州停留了一天。朝陽旅館，大陸飯店，那些我們記者曾經駐紮的舊地，記憶猶如昨日，但市容已經面目全非，因為敵人佔領的八年中，已經「建設」得頗爲「繁榮」了。在街上只看到對這「繁榮」的享受者，謳歌者，舊日的痕跡已不復見得。那些大轟炸時的屍體，那些臨撤退時破壞的建築物，那些互相踐踏扶老携幼的難民，都已爲新的「繁榮」和「緊張」蓋住，不能再看見了。

我不敢再攀登雲龍山，但我終於鼓起勇氣又獨自上去一次。那些你踏過的石階，你憑立過的石欄，一切依舊。山上的寺院，仍傳出古老的鐘聲，木魚聲，老和尚的龍經聲。他們，敵人到時不侵犯他們，保護他們，現在的受災難的人又向他們求籤問卜，請求他們指示「迷途」，而你，而你們，却不存在了，秋遠！

在雲龍山上，我又想到五月十三夜的一幕，那夜敵機夜襲，許多記者不期而遇地碰頭在雲龍山。那一夜我們知道了永城被佔，隨海路斷的消息，第二天便各自突圍，大家勞燕分飛，以後有許多人都沒有再碰面，我告訴你，這一群筆工作者，大半都還健在，而且筆和人一樣健康，仍在爲真理爲人民奮鬥，走着艱苦的道路。但也有很潮氣，過多的收入壓歪了筆尖，變成了說說的鸚鵡。這情形，也和你活着的時候，沒有兩樣的。

最近，碰到了一個過去的同鄉，談到了你，我順便問到你家庭的情形，因爲他和你住在同村，對你的家庭非常清楚。

你的家庭所遭遇的，真是一個典型的悲慘故事，如果你至今還健在，我是沒有勇氣告訴你的，這真是太悲慘了。
你的叔父（他的照片過去老放在你的桌子上，我常常看見，體格魁梧，面貌慈善。）已經去世了，他死得很慘。他原來不是在北平路局工作麼？北平失陷後，他

因為家裏的牽累，未及退出，後來便以姓埋名，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我想另外換幾個字，因為這個光榮的名詞已經被沾污了。）後來消息傳到後方來，以此傳說，都說他投降了「老日」，當了漢奸，你父親聽說後氣得半死，便寫了封長信責罵他辱沒祖先，並勸他立刻回來，很久沒得到回信，你的父親便又寫了一封長信，咬破指頭簽上名字，說如果他不同來便永斷手足之情。這樣一個月後，他接到你叔父一封信，也寫得很沉痛，披肝瀝膽地說明他不得已的處境，敘述他現在雖在虎口之中，還肩負着國家民族的責任。他的信是換了封皮假託在某某商號發的。但他不知道日本人早已已經檢查到你父親的信，早對你叔父布置下偵查的工作了，你叔父給你父親的信，雖然投遞得很小心，但終於落入日本人的手裏。

於是，你叔父被日本人鎗斃了。

你父親聽到了你叔父被鎗斃的消息後，悔和愧使他幾乎發瘋，他常常跑到野地裏獨自哭泣，日漸消瘦。但因為怕你老祖母知道，還得時常編造你叔父的消息，強顏為歡地左欺右騙，這樣過了半年，你祖母終於知道了這件事，於是哭昏了許多次，以後便被重病壓倒。你的父親又愧悔，又難過，又着急，曾經服過毒藥，幸虧家人發覺得早，救治了過來，但身體已經一天天羸弱，終日鬱鬱寡歡，常常飲酒賦詩，痛哭長歎，不久眼睛便有一隻失明了。

但，支持着他的精神，使他不至廢然倒下的，還有一個寄託，便是你——他唯一的愛子，你是他心裏唯一的一盞明燈。他雖然是一個老秀才，但他却沒有一般的濃重的宗法觀念，沒有一般老人對兒子的姑息溺愛。據說，他談到你的數年不歸時，總是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但他的心是難過的，一邊說着這些自慰的套語，一邊却已經淚流浹衣了。但，他那裏知道，在他日日夜夜念着你的時候，你已經在黃河的對岸，戰死在日本兵的刺刀下了呢？

你是一九四〇年犧牲的。但在這之前的兩年，已經很少有信了。有時候一年半載，他老人家才看到你幾行稀疏的字，這當然對他衰老的心是一種折磨。但也就為此，你犧牲後大家對他的工作也容易了些，雖然長時間沒有信，他覺得和往常一樣，並不往壞處想，他是堅信着「上天」對他不如此「不仁」，把他的唯一愛子再弄去的。

他一直不知道你殉難的消息，等待着你的勝利歸來。這是多麼殘酷的事。但大家又希望這欺騙能永久繼續

下去。

但在勝利前一年的春天，忽然又起了一陣颶風。這可敬可憐的老人，終於從零落的故枝上凋謝了。

那一年春天，河南的「商業化部隊」打了一個大敗仗，四十四天中丟掉了四十五個縣城，河南孤懸了幾年的半壁也被佔光了。你的故鄉懷慶，也踏上歸途。男女老幼，哭聲震野，大車小輛，都成了逃難的人，你父親在安排歸籍老弱送往鄰村之後，聽到日本兵已進村莊，他掛在標上自縊了。

秋遠！這便是你家庭的遭遇。在九年之前，你的父親叔父還是一鄉人望，還是小康之家，海洋着和平與幸福；但現在，却一切化為塵土。這是你們對抗戰付出的代價。我自己寫着，也覺得太像一個編造的「故事」了，但這是現實的真相。這九年中，這樣粉粹了的家庭，這樣比故事更悲慘的事實，也許任何一個村落都會找到吧！

但抗戰償還你的是什麼呢？償還和你同樣際遇的千千萬萬人的，又是什麼呢？少數的民族狂蟲，縱奪了並腐爛了勝利之果，忠於抗戰的人民，又被驅遣着為這些少數人流血。

秋遠！現在，我坐在一小個小的一盞孤燈之下，這是你熟悉的小城。窗外黑暗如漆，除了我自己的心音之外，所聽到的只是遙遠的犬吠，和寒風在樹間的嘶叫。這景象，正和二十七年的一夜，我們對燈默坐時的景象相同。只是橫在我面前的迢迢的路，已經和那時的全不一樣，而且再沒有你和我商榷了。

過去的一切，在記憶裏凝成一罇苦酒，一滴一滴地向我心的最深處湧流。

我記起了我們在閉封的時候，每夜同路去聽習英文，並肩在月下談論時局，那時，你還只是一個勤懇善良的教師。

我記得你從北平日本人的虎口中逃出來，訴說你們從海面上回來的艱險，你那時候已經成爲一個民族解放的先鋒。

我記起我們在徐州十二個晝夜的突圍，我們疲倦到一邊走路一邊打哈欠，我們幾天吃不到飯，抱一點紅薯充飢，我們在寒冷的四月天，穿着一套軍制服睡在打

麥場上，（遠處颶風聲）因為冷得難熬，只好抱着互相以體溫取暖。我記起突圍出來後你深陷的腿脛和乾得裂了的嘴唇。……但你並不氣餒，仍然堅守着新聞崗位，那次的突圍，你成了千錘百煉的戰士。

我記起了你遠行之前的長久沉默，你決定的時候緊緊握着的拳頭，我們分別時候你有力的握手。這時，你已成了真理的追求者。

終於，你的力量獲得了極致的發揮，你的生命燃起了最美最亮的光焰。

你的一生，從沒有沾沾自喜過，自己誇大過，以「進步」標榜過。你像是一條駱駝，默默無聲的載起人生的重載，又默默無聲地倒在沙漠之中。但我們的熱人之中，却有多少人已經成爲「驕驕」，受着主人豐盛的飼養，用筆編製謊言，却有時又賣弄他「習於人言」！

夜已很深，燈已將盡，我們的話就此打住吧！記得在抗戰發生的那年，我們合拍了一張照片，上面我題着「……春來冰先破，萬川一怒泉……」的句子，九年的時間，人民的萬斛鮮血，第一層冰是已經破了，但新的冰雪却又封凍起來，可是，經過兩年人民的戰鬥，又到了春來冰先破，萬川一怒泉的時候了。如果你還活着，一定是今日大風暴中的一只勇猛的海燕。

秋遠，請安息吧！我決不會忘掉你，許許多多的朋友也不會忘掉你。我們固不會為你勒石樹碑，但大家也決不會忘記你的死節。我們一定要替你向敵寇勝利成果的人索取報償，替千千萬萬和你同樣付出鉅大代價的人索取報償，不讓你的鮮血白流，不讓你們死不瞑目。

還有，要告慰你的，是你的哲嗣，已經緊隨着你的足跡走上你走的道路。他是一隻雛鷹，他的勇敢和智慧都超過了他年齡所應有的，他正生活在人民的大海，他正以你留下的筆和翰向人民之敵搏鬥。他受着朋友們的熱愛。這一點，對你該是最大的安慰。

最後，對這夜空，我還要舉筆對你宣誓，我今後要更勤奮地使用這隻破筆，紀證這人間的光明和黑暗，繼續你的足跡，把僅餘的生命力完全交給仍在苦難中的人民，不論這力量是如何渺小。

安息吧，秋遠！你到了應該安息的時候了。

方生未死之間 似彭

考驗社出版 八十七頁

這是一本小冊子，一共收了六篇文章。史任遠先生在序言裡說，「這里的六篇文章，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發展的新階段上最生的收穫。」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作者們不約而同的提出一個新的人生觀。這新的人生觀是有價值的，但是作為知識青年的安身立命之所，則是不夠的。

我們先來介紹本書所提倡的人生觀是什麼。

第一，他提倡我們用全副心腸去貼近人民：「冷淡和麻木必須死亡，慷慨和自私必須絕跡，虛偽和欺騙更是不容存身。代替冷淡和麻木是鮮明和積極，代替虛偽和欺騙是誠懇和老實，代替狹隘和自私是寬廣和實在。在的承認旁人，關心旁人，用全副心腸關心人民的命運，和他們結下死生不解之緣，由於我們所恨，愛其所愛。我們不但要擴大我們生活的廣度，加深我們生活的深度，而且要加緊我們生活的密度；我們不但要精通世故，而且要切進人情；我們不但要和我們人民生活在一起，而且要爬到他們的心去疼他們。」（于潮：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頁五三）

于潮文中所提到的生活三度，嘉烈在本書另外一文加以詳細的解釋。何謂生活的三度？

「三個通俗的詞彙確切的表現出生活的三階段——三方面：世面指生活的廣度，世故指生活的深度，人情指生活的密度。三個通俗的詞同樣確切的表現出生活三階段和三方面對生活對象採取的關係：說一個人的生活範圍廣，人們說他見世面大，見之一字道出這一段中人和世界的關係，看看而已；說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豐富，人們說他世故深，過過而已；說一個人心靈貼近旁人，人們說他近人情，近之一字道出這一段中人和人民的關係——到這里，生活者和生活對象的關係已經不復是走馬看花的看看，也不是曾經滄海的過過，而是體貼入微的貼近了。」（嘉烈：生活的三度，頁六二）

因此，作者們都提倡一種多情善感的生活：「真實的生活是以聽覺來接觸五聲，以視覺來接觸五色，以嗅覺來接觸五味，並且以敏感的心來接觸七情的。真實的生活是有着對友人的愛，對仇人的恨，是有着大喜，大悲，大快樂，大憤怒的。」（項黎：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頁四四）

他們提倡以這類多情善感的心，參加人民大眾的生活，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個。

「問題的重心在：我們不單是要在實際生活中去了解他們，而且要在實際生活中改變我們自己，改變我們的生活態度，變成他們當中的一個，而是以一個客觀的地位，生活在他們當中，我們既不能如實的寫出他們，也不能好好的領導他們；人民既不是研究的對象，也不是被領導的材料，假如你寫出他們的真情實感，那不僅因為你客觀地研究了他們的緣故，而是因為你在基本上是屬於他們的緣故，假如你領導他們的話，那不僅因為你了解他們，而是因為你基本上屬於他們。」（于潮：方生未死之間，頁三七）

以上這一些話，都有相當的道理。在學校里，教員們所專心的，只是知識的講授，而不大討論如何做人，這一類的書，可以彌補青年所受教育的一部份缺乏。在學校里，青年的衣食住及一切生活，已與中國的貧苦大眾脫離，這一類的書，可以給青年一種感覺，要他們不要忘記校門以外那些不幸的人。在社會裡，一般的人，都在日夕朝朝，時時刻刻，為自己的利益打算，這一類的書，可以給青年一種指示，要他們不要只顧自己，而要用全副心腸去關心人民的命運。這一些，都是好的影響。

但是，這種生活態度的指點，也有他不足的地方。作者們所提倡的態度，實在是一種慈母的態度。一個慈母對於他的愛子，真是做到由衷恨其所恨，愛其所愛的境地了，真是傷寒症的時候，他的慈母，即有一百二十分的愛，也不能解除他的愛子的痛苦。一個素不相識的醫生，對於這個家庭可以並沒有深刻的感情，但是在這種危難的時候，對於這個小孩，真有起死回生的功用。他之所以能夠有貢獻，不在他的情感，而在他的智識。一對正在戀愛着的男女，沿着河邊散步，一不小心，男的失足落水了，女的掙扎痛哭，淚如雨下，這是他「愛其所愛」的表現，但這千萬行的淚水，也救不起這個將要溺斃的青年。一個不相識的人路過，看到這種情形，他是善於泗水的，跳下河去，便把這個青年救起來了。他對於這個青年有貢獻，不是因為他有情感，而是因為他有技能。

這兩個例子，只是要說明一點，就是知識青年，如想真正的對於人民大眾的福利，有所貢獻，沒有一副好心腸固然是不行的，只有一副好技術，也是不夠的。知識青年，在能真正為人民服務之先，得培植自己，成爲一個有技術，有見解，能獨立，能組織的人才。否則他們到人民大眾的隊伍中去，只會成爲人民大眾的一種寄生蟲，一個加增人民負擔的累贅。

總之，我們以爲一個現代的知識青年，一方面固然要有豐富的情感，另一方面，也要有充實的知識。這兩方面，都是需要培養的。沒有情感的知識，固然是浮海無根，沒有知識的情感，結果也只能產生輕舉妄動。我們願意以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並重的看法，來修正全書中偏重感性生活的見解。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平字第二三四號

新路周刊

編行者：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編輯部：電話四局〇八五九號

電報掛號：三九六〇

經理部：電話四局〇六九三號

北平東直門大街九十八號

上海辦事處：電話四二二五五五五號

上海黃浦路十七號五一室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訂銷辦法：

一、本刊歡迎直接定閱及經售

批銷一律八折優待郵費外加外埠

特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二、在預定期間不受中途刊費

加價之影響

三、本刊每逢星期六出版批銷

戶提前一日發貨每期刊本起碼

四、寄遞方法請來函說明

五、本刊售價暫定零售每份四

萬元預定三個月八折優待加郵費

如下表：

平寄：四十萬元

掛號：五十二萬元

統平：六十四萬元

航掛：七十七萬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六、本刊定每星期六在上海北

平兩地同時出版凡華北區定戶請

向北平本刊經理部洽定其他各區

請向本刊上海辦事處洽定

本期定價四萬元